

QUAN DIAN

YU

ZHUI WEN

Shenzhen Wenyi Pinglun Wenxuan



圈点与追问

深圳文艺评论文选

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编

7

花城出版社

卷 一

都市与文学



深圳文艺：寻找自己的路

胡经之

优秀的文学艺术，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去感动人，鼓舞人们热爱生活，向往未来，为人们充实精神动力，提高思想境界。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要以美育代宗教，正是看到了文学艺术具有那种潜移默化而又不可估量的人生价值定向、高尚人格塑造的巨大作用。

深圳的文学艺术，在近几年有较大的发展。通过此次（第二届）大鹏文艺奖评审可以看到，参评的作品，不仅数量多、品种齐，而且质量好、水平高。深圳的文学艺术在进步，中长篇小说、影视艺术的成就尤为突出，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

曾经在数年前活跃的报告文学、纪实影视，发生过较大社会影响，起过应有的作用。但从今天来看，艺术加工不够，艺术概括欠缺，或拘泥于真人真事，太近实录，或着力于宏观鸟瞰，粗线勾画，不在艺术形象上下功夫，自然就难以生动感人。而近几年有较大发展的中长篇小说、影视艺术，逐渐跳出真人真事，转向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关系的刻画，展示深圳人的社会遭遇、人生命运。这些艺术形象，既有蓝领人，又有白领人、粉领人，五彩缤纷。

关注当下现实，探索人的命运，这已成为深圳中长篇小说、影视艺术的主流，不少作品已经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人物在社会中经历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喜怒哀乐，因而引人入胜。

当戏说历史、调侃人生、纵情声色曾在一些地方热起来的时候，深圳的文学艺术却在走自己的路：关注当下现实、探索人的命运。在我看来，这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正道。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确实难能可贵。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深圳的文学艺术必将形成自己的特色，蔚为壮观。

然而，我们的道路还刚开始，步伐也还不够坚实。深圳正要第二次创业，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前进，文学艺术如何跟上步伐？全国

的文学艺术也在迈开新的步伐，踏上新的台阶，深圳如何更上层楼？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艺术贵创新，不仅是形式，更要紧的是内容，都需要创新。国内文坛纷纷在倡导新人文、新都市、新市民、新体验，突出一个新，这没有什么不好。自《特区文学》倡导“新都市文学”以来，描写新都市人命运和心态的小说逐渐增多，佳作迭出，可读性强，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果坚持下去，不断创新，继续提高思想艺术水平，可以预期，“新都市文学”必将自成特色，独树一帜，为特区文学增添新的光彩，引人注目。深圳的文学艺术，需要继续关注当下现实，探索人的命运，反映时代新面貌、新精神。现在需要着重努力的是，如何在提高文学艺术整体水平的同时，精心扶持培育上乘精品。创作是关键，我以为要重视三个问题：

一 价值和真实的统一

特区生活五彩缤纷，丰富多彩，艺术创造的源泉丰富得很。海阔任鱼跃，作家、艺术家在这里可以自由驰骋，大显身手。但生活不等于艺术，从生活转化为艺术，必先对生活有真实深切的体验和感悟，然后才会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艺术创造缘起于要把对生活的体验、感悟表达出来。对生活缺乏真切的体验、感悟，只能无病呻吟或图解概念、胡编乱造，谈不上真正的艺术创造，只是伪艺术。但是，在对生活的体验、感悟中，蕴含着对人生意义的价值评判：作家、艺术家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也必然要表现在艺术创作中。文学艺术，按其本性和根本使命来说，就是要肯定真、善、美，否定假、恶、丑。尽管人生多艰难，世界未来应更美。关注当下现实，探索人生的命运，题中应有之义，亦该包涵人生价值的思考。只有感悟时代精神，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从审美理想高度来看待人生，才能分清真善美与假丑恶。自己有了美好的心灵，才能去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对庸俗、虚假、丑恶的津津乐道，垂涎欲滴，是对生活中无价值、负价值的肯定，只能表现出自我格调的低下，品位的低俗。从真切的体验、感悟出发，按照自己的高尚理想、审美情操来提炼、加工，揭示人生的真正价值，这该是提高艺术品位的必由之路。我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和足够重视。

二 形式和内容的适应



文学艺术创造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世界。可是，要把创作意图化为艺术形象，必须经过二度形式化。先是通过“意象经营”，精心构思，从体验生活、感悟人生中积累起来的印象，被编织成多种多样的意象，构筑成一个由人物、情节、场面等意象相互作用的艺术世界。但这艺术世界还只存在于作家、艺术家的内心，还只是腹稿，尚未外化。只有经过“意象经营”，掌握一定的物质手段，把内心的构思物化为一定的符号，或是语言符号，或是非语言符号（声、色、形等）。在我们这个物质生产迅猛发展的世界里，艺术生产常常沦为一般的物质生产，只注重物化、外化，却忽略了意象的精心构思。越是长篇巨著，就越需要精密的构思，把人物、情节、场面等作巧妙的安排，意蕴也就从这些意象中自然流露出来。我们的影视艺术，有的摄制水平颇高，但脚本缺乏精巧的构思，就很难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爱森斯坦电影大师所说的蒙太奇组接，并不只是技巧，它还涉及艺术的构思。如果艺术构思失败，脚本不好，上台的明星再多，亦无济于事，影视舞台上已有不少教训，要提高影视创作的艺术水平，应特别重视艺术构思这一环节。不妨采取些有力措施，鼓励作家和编剧的合作，在艺术构思上多下功夫。

三 鼓励风格多样，促求雅俗共赏

文学艺术应该讴歌开放改革，高扬时代精神。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内化为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心灵律动。

时代呼唤崇高，我们需要歌颂崇高的艺术。但也需要有悲的艺术、喜的艺术，诙谐、幽默、壮美等多种风格的百花齐放。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但根本目的都在肯定真善美（包括崇高），否定假恶丑（包括卑鄙）。揭露、嘲笑社会中的腐败、黑暗、丑恶，为的是肯定生活的真善美，有利于开放改革，推动历史前进。我看田升的讽刺小说，不仅窥见了社会角落的丑陋，而且在笑声中感悟到了生活应该并且可以更美好。这样风格的作品，在深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明白了，开放改革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基础），而且为了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其中包括现代文明的建设。如何建设深圳的现代文化？台湾陈澄雄在谈深圳交响乐的发展时，强调要从深圳的实际出发，我亦有同感，深以为是。深圳

的文化土壤较为疏松，尚未板结，自由灌溉，可塑性大。港澳的流行文化在深圳风光了好一阵，究其根由，也要怪自己内囊空虚，人家乘虚而入。后来，意识到了，倡导高雅文化，当然好。交响乐、芭蕾舞、京剧等传统艺术（西方和中国的）也开始在深圳活跃起来。这些古典高雅艺术，我借用王国维的话，称之为“古雅”。推广、普及“古雅”，这本身就是文明的标志；更何况，在此基础上，将“古雅”推陈出新，萌发出“新雅”，这更是建设现代文化的重要途径。

但是，我们在倡导高雅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通俗。通俗文化也要一分为二，有优秀、庸俗之别。对优秀的通俗要发扬，对低俗的要提高，对庸俗的要剔除。华侨城文化建设之所以既能吸引国外又能吸引国内，就因为不仅移植了西方高雅文化中的精华，而且又挖掘中国民俗文化中的精华，加以弘扬、提高。常听人说，高雅与通俗，泾渭分明，势不两立，只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不相干。我却觉得，并不尽然。高雅与通俗本来就是相对的，而且可以互相转化，为什么不能促进高雅和通俗的相融和互动，鼓励多创作出为更多人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作品呢？

普及古雅，鼓励新雅；优化通俗，清除庸俗；促求喜闻乐见，雅俗共赏，深圳的文化建设必能更上层楼。



特区社会变革的艺术观照

——深圳特区文学发展进程的回顾与思考

吴俊忠

中外文学史上，关于文学发展的历史原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为“太平盛世说”，一为“社会动荡说”。前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每当出现“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文学就繁荣，就发展；而后者则认为，19世纪的俄国文学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不到100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出现一个文豪林立、群星灿烂的奇特景象，是因为动荡不安的俄国社会迫使文人贤士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探索“谁之罪”和“怎么办”的问题，从而导致文学的繁荣。如果说这两种观点均不无道理，那么，深圳特区十年文学的发展动因，则可用“社会变革说”来概括。特区的开创、初建和发展，每一阶段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有社会规范的变革，生活方式的变革，也有思想观念的变革。这一系列的变革，伴随着特区发展的进程，波及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内心世界，由此引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生存意识等均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在开创、建造、完善特区这个新世界的同时，也在构造和丰富一个新的内心世界。社会的变革带动人的变革，特区人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正逐步形成有现代气息的全新的文化心态，朝着人的现代化迈进。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如此广阔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亲身感受特区社会变革的深圳作家群，以其开放的文化心态和独特的现代审美意识，及时、敏锐地把握社会生活的脉搏，写出了一大批反映特区社会变革进程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体现特区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表现不同发展阶段特区社会变革的不同层次，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特区社会变革的艺术观照。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特区社会发展的奔腾气息，也可以看到特区人努力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步步足迹。

一 面对一个新世界的痛苦和怅惘

诗人艾青80年代初考察深圳时，曾写下热情洋溢的诗句：“我歌颂一个新的世界”。确实，把毗邻香港、处于两种社会制度交界口的深圳建成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不啻建造一个新的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的诞生，有的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的憧憬美好的未来，有的则经历了痛苦和怅惘。特区开创伊始，许多习惯于在旧观念的框圈内生活，对创建特区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人，在划定特区边界、征用土地这样一些新事物面前，被思辨不清的烦恼和难以割舍过去的痛苦缠绕着，经受着特区社会变革初期的种种阵痛。这是特区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迈出这一步，才能登上创建和发展特区的通途。特区的作家们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准确、细腻地反映了新世界诞生前夕的“心路历程”。

老根伯（朱崇山《萋萋青草地》）当年曾是武工队的堡垒户，他无法理解在渗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地上用铁丝网划定特区边界的现实，更不愿看到“尖尖的烈士纪念碑沦落成街边凉亭”，内心承受着阵阵的刺痛。这位“老革命”所遇到的“新问题”，作者没有作正面解答，而是留给读者去思索。作者相信，读者一定能从老根伯的不无幽怨的神情和言语，感悟到划定特区边界线在一部分人心中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从而感受到社会变革的艰难和震荡。然而，社会要进步，就必须变革，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可避免性在李建国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次收获》中所展现的是另一种震荡。长期守着祖先开垦的土地过活的老大妈，面对着平地建起新城的巨大变革，内心充溢着不可言状的痛苦。她难以接受“再也不能耕耘，再也无需收获”的现实，虽然明知未来的发展“是件值得开心的好事”，可仍禁不住“心里一阵发酸，眼泪差点儿流出来”。这是一位传统农民在特区步入现代化前夕所必然产生的内心痛苦。她长期信奉的“没有田的农民不地道”的传统观念，势必导致她对土地的依恋，对“最后一次收获”的深情不忘。作者准确地反映了特区创建初期征用土地对传统农民心灵撞击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即在土地被征用后农民所面临的何去何从的怅惘和抉择，则在叶明镜的短篇小说《五百万》中得到了集中表现。

市征地办公室给田贝村补偿了500万元征地费（《五百万》），田贝村



的农民(其中包括党员干部)因此经受了一场两种思想意识的激烈交锋。面对着500万元,富有现代观念意识的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若水,思考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方案,计划用这笔钱作基础,引进外资办厂;可是,以前任党支部书记张立人为代表的一部分农民,受小农意识的影响,主张把征地费瓜分。两种思想意识交锋、斗争的结果,张若水的“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方案终于获得通过。这场交锋,使农民经受了教育,逐渐摆脱了小农意识,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和升华,为进入工业化社会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五百万》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结局,表明特区人能够自己走出新世界诞生前夕的短暂迷惘,那么,《萋萋青草地》和《最后一次收获》所表现的阵痛,则在客人的诗歌《深圳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解脱:“这个广告色嗡嗡麇集的城市/踽踽而行甲虫似的巴士、的士/隐身其间,让我忘掉自己/物质的声音、金属的音节以及酒/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我在圆形的谈判桌旁/当我举起一只高脚的闪光酒杯/深圳,那时我才对你说些言语/说些很智慧的言语”。诗人面对喧嚣、嘈杂的都市人文环境,希望我们在思考中认识到:一个新世界诞生前夕,一些人感到怅惘和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此对社会变革产生模糊认识,更不能因此附和指责,增添忧虑。必须站在时代前进的高度,全面看待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心灵震荡,明确这痛苦、怅惘的产生和解脱,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特区社会不断变革的动力。特区建立11年后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诗人的希望正在实现,特区正在变革中前进!

二 初进一个新世界的困惑和奋起

特区的建立诞生了一个新的世界,它给人以希望,也给人以新的考验。初进这个新世界的人,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又那么陌生。如何适应这个新世界,是特区发展初期摆在每个特区人面前的紧迫而又现实的问题。这既需要豪迈的创业精神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也需要理性的思维和情感的升华,还要有否定旧的自我的勇气和忍受孤独、寂寞的毅力,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乃至情感特征方面都需要经历一次裂变。在这个裂变过程中,困惑和奋起常常是一对孪生兄弟,或相伴而来,或接踵而至。这是特区人在社会变革阶段的又一段“心路历程”。特区



的作家们及时感受或亲自走过了这一段“心路”，敏捷而又深刻地揭示了这段“心路”的各个层面，艺术地记载了特区社会变革的新里程。

特区建设引进外资，吸引外商来深圳招工办厂，随即出现新的劳资关系，这是特区初期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也是引起初进这个新世界的人们发生心理更新和冲突痛苦的重要原因。陈荣光的短篇小说《老板·女工们》中的肖娟的爸爸，作为老一代的代表，对“搞了30年社会主义，今朝却恭候老板进来开店办厂，堂堂正正地剥削”，怎么也想不通。他不无哀怨地感叹“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这反映出在旧社会饱受资本家剥削的老一代人，无法理解特区改革开放进程中引进外资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他们对新的劳资关系，有源自朴素的阶级感情的情绪抵触，也有对改革开放缺少全面认识的理性排斥：前者使他们烦恼不安，后者则使他们痛苦和焦虑。他们怀着极不情愿、十分矛盾的心情，步入特区这个新世界。但是，同样面对新的劳资关系，新一代青年则在新奇、困惑乃至痛苦的过程中，实现了观念的变革和保持了人格的独立。肖娟（《老板·女工们》）本着“有所失才会有所得”的想法进外资厂，在亲身感受到老板对工人的苛刻和无情后，不惜冒着被老板开除的危险，挺身而出维护工人的利益，既保持了自身的人格尊严，又在一定程度上感动和教育了老板；吕振中（丹圣《小姐同志》）虽然对合资企业的劳资关系和人事纠葛感到陌生和困惑，甚至把“小姐”和“同志”合在一起称呼，但他在盛气凌人的董事长小姐面前，不放弃原则，不丧失人格，而是以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对方的尊重和爱戴；李建国的《公方厂长与私方厂长》中的“我”，面对私方厂长的辱骂，以压倒对方的气势，喊出“这是深圳，我们的工人不允许你们任意侮辱”的心声，继而断然拒绝对方的贿赂……作家描绘的一切表明，特区引进外资，产生新的劳资关系，作为特区社会变革的一个方面，虽然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惑和苦恼，但它无损于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相反，它倒促使人们在交了一笔“学费”、经历了短暂的困惑乃至痛苦后，实现观念的更新和精神的奋起，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如果说劳资关系引起的心理嬗变，只是表现了人们对这一具体事物的认识和看法，那么特区建立初期创新与缺憾并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初入特区这个新世界的人们的影响，则是全面而又深刻的。人们被迫对



自己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调适和更新。有的赞赏“这里是一片沃土”，如鱼得水，弄潮于风口浪尖；有的感叹这是“别人的城市”，挥泪而去，寻找新的归宿。“在深圳的天空下”出现一幅社会变迁、适者生存的壮丽图景。其中的风风雨雨，痛苦和困惑，激昂和奋起，亦在特区文学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报社总编辑秦雷（李兰妮《夜，在深圳……》），从行为到思想，均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然而也正是他的种种矛盾，展示了他变革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轨迹。他忍受着夫妻分居的感情饥渴，可他在饥渴中理智地抵御了许园园的感情攻势。尽管许园园对他办好报纸至关重要，并且，他作为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对女人怀有天生的保护之心，可他为了办好报纸，硬着心肠把不适合报社工作但又恋着报社的卢莎调出报社。他在爱情、道德和事业成功的天平上，时而倾向前者，时而倾向后者。前者显示出他在特殊情况下的人格完美，后者反映出他开创事业的坚毅和执着。他在奋起中潜藏着困惑的阴影，在困惑中隐含着奋起的力量，矛盾的综合体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主动适应新世界的强者的身影。

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干部职工（刘树德《在深圳的天空下》），原是一支打大仗、打硬仗的队伍，立过赫赫战功，被军委命名为“英雄团”。但是，全团复员到深圳后，技术、能力、水平不达标，挑不起重点工程，干不了高层建筑，公司陷入困境，以致于“公司内百分之八十的青年都面临着找媳妇难的问题”。他们对特区这个新世界的适应，不仅要承受在新的条件下否定过去的痛苦，而且要走过变革和完善自身的艰难的历程。他们不愿接受感情的施舍，更不甘在新的征程上垮掉，但他们也决不抱残守缺，在流淌出不轻弹的男儿泪后，终于迈出寻找新的适应方式和新的位置的关键一步，走向充满希望的明天……这是一大批特区建设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进行的一场悲壮的自我革命。谁能说他们不是英雄？谁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给我们展示的是初入新世界的人们经历困惑和奋起的另一种图景。齐欢和齐乐这姐妹俩同处特区，姐姐把特区称为“别人的城市”，把自己喻为“客人”，而妹妹则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关键在于姐姐齐欢对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缺少足够的理性认识，对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缺乏正确的估计，但她却又在匆匆地寻觅爱情和幸福。认

识的不足导致行为的盲目和偏差，行为的不良后果，又使认识带上更多的感情色彩，距离实际更远，终于在“别人的城市”中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妹妹齐乐却与姐姐相反，采取积极的方式适应这个新世界。虽也不无困惑，但从不多愁善感，始终奉行务实、乐观的人生态度，因而潇洒自如，奋发有为，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至于行为方式和情感特征酷似齐欢的段志，在离开“别人的城市”后的重新复归，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当你步入一个新的世界，唯一的选择是积极地适应，逃避是不行的，逃避必将带来新的空虚。

三 完善一个新世界的思索和超越

特区新城市经过数年发展，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外来文化、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相交汇的多元文化结构，以及经过变革的现代城市文化氛围，从各个不同侧面向人们散发着诱人的光彩。但是，特区的历史毕竟还不长，作为一个新世界，它还并不完美，在许多方面仍不无缺憾，还必须展开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尤其要加速协调城市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塑造出了解现代城市文明、适应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一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发展新阶段的社会变革，更突出表现为人的深层次变革。人们要完善这个新世界，同时也要完善自身，要在思索社会、超越自我的过程中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区作家对完善新世界的深层次变革，感受深，反映快，及时地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调整、形成新的人际关系，以适应特区发展新阶段的社会实际，是特区人思索社会、超越自我的重要方面，集中表现在人才选用、共事交往等社会生活层面上。龙口工业区董事长张弓（朱崇山《淡绿色的窗幔》）为了集装箱厂的建造与发展，亲自把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曹白从北京请到龙口，工作上信任、支持；生活上关心照顾，乐意给曹白当跑腿，为曹白调技术骨干，调爱人，劳碌奔波，关怀备至。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这种豁达、可贵的领导风格，若没有对特区发展急需人才的思索和认识，没有变革传统干群关系的胆识和气魄，没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是决难形成的。而曹白不辜负张弓所望的出色表现，更是充分证明合理选用人才，形成新的干群关系，是特区发展新阶段带根本性的变革，对于完善特区、促进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然而，调整人际关系既然是一场变革，就不可能诸事顺利，必然也要经



受痛苦和困惑，甚至还可能会付出代价。刘鼎同样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老干部（杨燮仪《蒿蓬代柱》），同样爱惜人才。但由于他在人才使用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仍带有旧的思想观念的痕迹，不能摆脱信任老下级、老同事的传统思维方式，不能扬弃有害于事业发展的“人情味”，错用怀着野心投奔他的余惊天，致使他惨淡经营数载，并获得卓有成效的风华工贸公司这首巨轮面临即将沉没的危险。刘鼎错用人才造成负面社会效果的惨痛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调整、形成新型的特区人际关系，必须同旧的观念意识彻底决裂，若是守着旧观念去谋求新关系，不但不能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而且还可能损害事业的发展。也正是因为此，这才称得上是一场变革。

在特区发展进程中，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自我，表现自我和超越自我，把自身现代化融汇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人的现代化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这是特区社会深层次变革的重要表现，也是特区人通过自身完善这个新世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此，《他们要干什么》（李兰妮）、《每当变幻时》（刘学强）、《你不可改变我》（刘西鸿），以及《下一站》（张伟明）这几篇小说，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集中而又深刻的表现。

沈小桔（《他们要干什么》）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大把钞票，只身来到深圳某报社工作。她工作不顺心，生活不如意，爱情、事业，无不坎坷曲折，困难重重。潜在的自卑表现为极度的自尊，强烈的竞争意识促使她在寻找自己的位置的过程中，常常感情用事。然而，人是环境的产物，现实使他认识到“深圳不相信眼泪”，明确了在良性竞争中显示真正自我的道理，努力寻找和把握“人与人之间的适当距离以及适当位置”，终于塑造出一个敢做、敢爱的全新的自我，完成了人生的一大超越。特区这个新世界造就了她，她也为这个新世界增添了光彩。

李江、涓涓、阿龙和嘟嘟（《每当变幻时》）象征着特区社会生活中青年的分化。弥漫着浓厚的商品经济气息的特区社会，对青年散发出五光十色的诱惑，使青年编织着各种各样的梦，面临着奉行实用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或兼而有之的选择。李江为了不因知识贫乏而被日新月异的特区生活所淘汰，不惜辞去报酬优厚的工作到职大攻读英语，追求知识的价值；阿龙靠伸手向父母要钱挥霍度日，生活在虚假的满足而实际的空虚之中；嘟嘟在感受了生活的艰辛之后，价值的天平倾向金钱，过着物质上乞怜于别人、精神上极端贫困的生活；涓涓一度被贫困所扭曲，在幻

想金钱满足的同时，放弃了对理想和知识的追求；但他在李江的影响下，终于被知识所唤醒，明确了“追求本身就是否定”的道理，敢于否定自己，建树新的自我，迎接理想的召唤。这几位青年“在追求中对比、淘汰、更新”的事例，表明特区社会生活的变幻直接影响着青年人生的变幻，而青年在变幻中“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完善平衡”的具体行动，正是对特区这个新世界和他们的主观世界的最好的完善。

孔令凯(《你不可改变我》)虽只是个16岁的少女，却已经具备强烈的自主意识。她懂得“人应该及时展示并且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失时机地选择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她不被别人左右，即使是自己最信赖的朋友，她也毅然喊出“你不可改变我”的心声。她是特区青年表现和超越自我的具象和概括，是个性意识和自主意识觉醒的典型。对现时和未来的青年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具有这种自主意识的青年愈多，社会进步就愈快，特区这个新世界也就愈完善、愈美好。

《下一站》中的“我”和他的伙伴们在对待失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潇洒，在表现特区青年思索社会、超越自我方面，具有更深的含意。它表明，特区青年对特区新的社会特征，已从被动适应发展到自觉认同，在职业观和人生观方面，正在实现新的超越，特区现代化所要求的一代新人已在社会变革进程中逐步塑造和涌现出来。

特区变革，牵动神州，震撼世界。特区文学，洋洋大观，气势不凡。这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又一生动例证。鲁迅先生曾指出：“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敏感地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转而影响社会，使其变革。”事实表明，特区文学不仅生动、形象地反映社会变革，而且以其艺术的感染力，影响和促进特区社会的变革。作家在展现特区社会变革的表象的同时，着眼于表现变革所带来的人的心态、感情、观念、性格等方面的变化，让人们认识到特区社会变革的深层轨迹和心路历程，促使人们更深刻地思索社会和人生，并进而以自身现代化的具体行动，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在特区，“你不可改变我”、“深圳不相信眼泪”等文学语言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便是文学影响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有力例证。

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说得好：“文学不是在地上，而是在时间的流沙上留下足迹”。特区文学给我们留下的是特区社会变革的足迹，亦是特区人加速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足迹。透过这步步足迹，我们感觉到特区的沸腾生活，看到特区发展的美好前景。我们深信，特区文学将把这足迹一步步延伸下去，走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艺术与生活的“悖论”

——兼析深圳艺术创作的某种非艺术化倾向

李小甘

举凡舞文弄墨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文艺创作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的教谕，可现在文艺创作的实践却时常昭示着一个逆向命题。张艺谋在电影故事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虚拟了一个灯笼的神话，通过点灯、封灯、毁灯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画面去映衬题旨。而据民俗学家的考据，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向来并没有“点灯”的例俗。所谓“点灯”纯属于虚乌有的“伪民俗”。张艺谋显然不可能熟悉“点灯”这种“生活”。然而，他依据生活的内在逻辑，将影片的意象物化为一盏盏的灯笼，被誉为“神来之笔”。作家史铁生是位残疾人，他困于轮椅上而从未涉足爱河时，其作品有关爱情的描写，比许多“情场老手”笔下的风花雪月要缠绵动人得多。作家贾平凹在西安城里写出了表现乡村生活的“商州系列”。最近他头一回创作正面反映西安现代都市生活的小说《废都》时，反而跑到陕西关中渭河北岸的一个小村庄去。正如美国小说家所称的“为了发现自己的家乡，就要离开它”（《一部小说的故事》）。贾平凹自己则称：“离开商州才能写商州，摆脱城市或者对写城市更好些，一是从认识上，二是从情绪上。”也许，他裹着羊皮袄、点着蜡烛灯写起西装革履的城里人穿行于璀璨华灯下的那份洒脱，更容易找到感觉。同样令人惑然的，众多作家在写历史跨度大的作品时，最具神采的往往是作者最不熟悉的阶段：写古战场金戈铁马的浴血时，直写出剑戟交锋的铿锵；写旧时代大家族的颓落时活现出众叛亲离的狰狞。近期当代小说的几部力作，从苏童的《半》、洪峰的《东八时区》、格非的《边缘》，到余华的《活着》，把旧时代的人情世故、世态炎凉描画得栩栩如生。难怪《文学报》上最近用黑体字赫然亮出了一个当今文坛之谜：“生长在新社会的作家反倒成为写‘旧题材’的能手。作家笔下，论写作的优劣，为什么反倒是写经历过的社会不如写没经历的社会



呢？其中奥秘，谁能解说？”（《文学报》1993年2月18日）。

笔者无意去探幽究秘，但我觉得出现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了距离感后，有了一种俯览人生场景的审视态度，有了一份于思维空间纵横捭阖的洒脱与超然。作家与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旦进入一个较为陌生的时空，一旦失去可以描摹的生活原型，其想象力反而如脱缰之马，可以撒欢儿地跑。或如西晋陆机所说的，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这在美学理论上本来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

让我们再将视线瞥向深圳文坛。尽管深圳的文艺创作在岭南乃至全国开始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数年前，就有人提出了深圳文艺创作的一种现象——作品过于拘泥于生活的原型，胶滞于生活本身。或如评论界的人士所言的：深圳的文艺创作“透过新闻视角的追踪和人物行为动机的表层揭示多，各个侧面的场景描写多，用静态的理性思维贯穿作品多”（胡滨《“文学性”一辩》）。深圳的一些诗歌不过是建设工地上的豪言壮语，一些散文实乃词藻稍为优美一点的新闻通讯，一些报告文学严格上讲仍是有“报告”而无“文学”的长篇特写，而一些小说反倒成了名副其实的“报告文学”。几年前笔者在《当代文坛报》上撰文评过一部中篇小说，它写的是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在特区改组为建筑工程公司卷入市场经济漩涡时的苦痛与奋争。这部小说便是作者在一个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与生活贴近得使人几乎分不清它是生活，还是创作。作为深圳前十年文学创作总结的《深圳特区文艺丛书》，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选，其中类似“到旋转餐厅上来吧/彩色的楼群，山河美景/就你脚下展开/一切那么新鲜、神奇”（《国贸大厦三咏》）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就是获1992年全国报告文学奖的《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缺乏艺术提炼的糙瑕之处。如该文第二章第二、三节中，便有颇为冗长的关于购买钢材与水泥的过程的描述，作者囿于铺陈事情的始末与有关数据。由此出现了深圳文艺创作的某种非艺术化倾向。作家、艺术家们被沸腾的生活所感召，作品中溅出灼炽的激情，但其作品往往只是现实生活的简单摹写或再现。这令人联想到19世纪后半叶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于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它在艺术中再现生活现象，而不是从思想上、审美上来理解和评价这些生活现象，摹写现实而不对现实的本质方面进行艺术概括。难怪外地文艺界同